

中國大陸政經制度類型 與習近平的制度趨向分析

徐淑敏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摘 要

中國近 40 年改革，已面臨轉型問題，其主要爭議在於左右之爭。中共中央對於未來制度轉型的具體原則迄未形成定見，而大陸左右各派觀點分歧極大，亦均提出某種屬於意識形態性質的未來制度選擇之偏好傾向，意欲影響中央未來政策轉變。本文即就上述背景，對中國政經制度未來發展，進行探討與分析。本文的分析架構，係採用類型分類的方法，從「政治」與「經濟」兩種制度面向，以及「左派」與「右派」兩種意識形態傾向，演繹為四種模型，探討中國未來制度轉變的意義及可能選擇方向的觀察。同時，亦在於對中國改革開放多年後，做一個初步的評價與反思。本文進行分析的四種類型，包括廣東模式、重慶模式、中央政策模式，以及第三條道路。制度的分析與探討，有利於發現中國當前所存在的諸多問題，並獲知可能的發展趨向。至於中國未來的制度究竟如何發展，無可避免的將涉及本論題之外的諸多其他因素。本文僅就論述範圍，進行分析探討。

關鍵詞：左與右、重慶模式、廣東模式、第三條道路

壹、前言

中國在三十年的改革之後，的確面臨著轉型問題。目前這個問題還沒揭開蓋頭，在北京、上海的大城市各種傳言此起彼伏。在北京的思想界，可用「暗流湧動」形容，而這些問題的主要爭議，在於左右之爭（榮劍，2012a）。

中國存在的左右爭論的問題，不僅呈現在經濟議題上，也出現在政治議題上。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已經面臨重要的轉型問題，主要包括政治與經濟制度轉變上。在中國大陸，只要不逾越某種程度的界限，或者可能影響統治威信的討論，網路到處可見，甚至各級地方政府也不避諱邀請「右派」專家學者發表他們屬於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觀點。在這樣的情勢中，探討中國未來政經發展目標的時機可謂逐漸成熟。

中國大陸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存在所謂「左右之爭」，顯然在鄧的政策原則之下，隱然出現了兩種不同意識形態的思維。易言之，以鄧小平的政策為中線作為分界，改革派即成了右派，而保守派即為左派。這種說法，是從意識形態觀點籠統區分，可以視為中國大陸既存的左、中、右三派。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被內部左右之爭中視為中間派，但若更進一步的細分，其經濟政策應屬右派，而政治立場仍屬居於左派的基調，惟只存而不論。綜而言之，從邏輯而論，既存的分類，並不嚴謹與清晰。

趙紫陽在軟禁期間曾指出，中國如果長期處在「政左經右」的體制下，必定矛盾叢生。他說：「我現在認為，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要配合；不配合，搞市場經濟，還是無產階級那一套，這兩套很難長期在一起，矛盾會很多（楊繼繩，2005）。」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展江（2012）更明確的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已經走得很遠，但在政治上，總體說來還是堅持原來的意識形態。因此，政治與經濟並不是同步發生變化，於是，就出現了「政左經右」這樣的觀念。從它們的觀點可界定中共中央的政策屬性為「政左經右」，而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不同調衍生出許多的問題，卻是不爭的事實。

本文的目的，在於對中國具有未來發展性質的重大議題，提出一種前

瞻性的思考與觀察，其做為探討論題的主要意義，在於如下兩項陳述。其一、中國大陸左右各派觀點分歧極大，各方並積極表達了某種屬於意識形態性質的未來制度選擇的偏好傾向，其目的意欲影響中央未來政策的轉變。而各種爭論中的不同觀點，亦僅僅是做為一種「目標」而提出，缺乏深層政治思想的理論性分析，亦均尚未形成具體政策制度的理論性內涵。其二、關於中國未來可能形成或選擇何種的政治與經濟制度類型？如果僅僅限於大陸內部對「重慶模式」及「廣東模式」的「理念型」（ideal type）關注，則極有可能衍生出其他意料之外的任何類型，甚且不能作出相對應的比較。基於此種思考，本文擬就中國未來制度轉變可能類型的問題，依據邏輯的分類方法，在第二節首先提出一種分類的方法與指標，列舉四種制度類型的模式，做為觀察分析的工具。

至於本文的類型觀念是否允當，本文將採用訪談方式，借助國內學者專家受訪者，就其個別主觀認知提出觀點，以作為最後對照本文所提原創性類型概念的適當性，進行比較分析。

依據第二節的分析架構，在第三節，就四種類型的特徵，按「重慶模式」、「廣東模式」、「中央政策」以及「第三條道路」進行比較分析，嘗試給予本文分類的論證。在第四節中，就習近平的政治與經濟政策在制度類型的面向，以專家訪談方法，徵求專家學者的意見，進行對本文所提類型意義的檢證。最後，作出本文的分析結論。同時，在本文整個分析論證過程中，亦對中國近四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政策內涵意義，進行初步的評價與反思。

貳、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

一、分析架構

中國大陸當前關於未來制度變革的相關理論之探討並不充分，惟冠以「模式」或「經驗」的論述則很多。榮劍（2012）指出，中國大陸改革的理論資源最為貧乏，無論西學、國學、馬學都有不足之處。學者們把重慶

近五年來的社會發展和制度安排，視為中國目前最值得關注的制度現象，因為它客觀上激發出了人們對於中國未來走向的一種想像。在這種想像中，左派和右派都在按照他們一貫的思維邏輯，期待它成為全國性樣板，或者僅僅為一個地方性實驗。

大體而言，無論「重慶模式」或「廣東模式」，係就現況事實所提出的政治與經濟制度類型，因此至多僅能視之為一種「理念型」，而在平行的概念層次上，是否存在其他的類型？仍值得商榷。簡言之，就邏輯觀點來看，上述類型分類並非完整。因此，對上述問題的分析，即應首先提出合乎分類邏輯的某種分類方法，以求分析的合理性。

美國學者 Judith Goldstein 與 Robert O. Keohane, 1993: 3, 25) 使用 Max Weber 理念型方法，來建立他們在類型上的分類目標。兩位作者承認，此種在觀念上的劃分方法，並非可以確切的反應現實。實際上就是，未能符合類型學的關鍵要求——周延與互斥，這種觀念類型的分類方法，並非類型建構的邏輯方法 (Marble, 2002: 195-96)。

法國學者 (Mattei Dogan, 2010: 56) 指出，有些學者所界定的相互對立的模型，並沒有覆蓋實際現象的完整連續譜。此種不連續的缺點，可以經由二分法，經由兩個概念產生具有意義的一個四極的方案。然而，一個抽象框架中的所有類型均能在現實中被發現，此種情況也並不多見。

本文認為，中國大陸在政經演進發展過程中的變數仍多，現況尚未顯現的類型並非絕無可能存在；同時，忠實於科學的邏輯分類，在研究分析上有其立論的嚴謹基礎。因此，本文仍然選擇以兩變數、二分法，為原則的分類模式，並以因而獲得的四種類型，進行對中國未來政經模式可能轉變的觀察模型。

必須闡明的是，意識形態左與右的界定，從來並不截然分明，而是呈現一種寬廣範圍的光譜分佈。右翼政黨與左翼政黨、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種相對立場的界限與融合，一直是學者所熱衷探討的問題。然而，此種定義及分界，已經相當難以釐清。就「社會主義」來看，「保守主義」及「新自由主義」均被視同「右派」。然而，Giddens (1994) 在其《超越左與右》一書中解釋「保守主義」及「新自由主義」

時指出，「右派」這個名詞，在不同情況下與不同國家中意味著不同的所指。例如，「新自由主義」在最基本的意義上，不是保守的，反之，它主張擴張市場，而轉向激進。同樣的，「左派」也從激進轉向尋求對福利國家這種目標的保守。Giddens 所說「第三條道路」，則是就英國背景而言的「超越『老左派』與『新右派』」（beyond Old Left and New Right）（Driver & Martell, 2000）。

但從中國大陸的現實情況而論，左右之分，還是有一種具體所指。大陸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秦暉指出（秦暉，2006），大陸左右派的言論傾向，例如，意欲「得勢」的左派，就要強調「擴大政府的權力」，而避談「追究統治者的責任」，而這兩者均應為左派的主張；同樣的，意欲「得勢」的右派，就要強調「推卸政府的責任」，而避談「限制政府的權力」，而同樣，這本應都是右派的理念。本文將左右觀點的區分，整理如表 1。

表 1：左派與右派的屬性區分

	左 派	右 派
政治	擴大政府的權力 重視群體責任	限制政府的權力 強調個人自由
經濟	積極干預 重視社會福利 主張分配的公平與正義	自由放任 重視經濟效率 主張市場的自由與效率

資料來源：依據秦暉（2006）整理製表。

就中國大陸現存的各種觀點而言，即使在本文的分析中被給予左或右的描述，並不一定就是西方意義的左右。但為了便於分析，吾人仍可以將其視為意識形態光譜這個大範圍中，位於中線以左的這一區段來討論。易言之，在本文的分析架構中，即使被歸類為「政右」且「經右」的這一模式，從西方的觀點來看，仍然屬於左派的性質，至多也只能視為傾向西方的一種未來可能目標。

本文的分析架構，首先，從「政治」與「經濟」兩種制度面向的指標，以及「左派」與「右派」兩種意識形態傾向的指標，來觀察中國未來制度變革的趨向，即可以得出四種分類模式，如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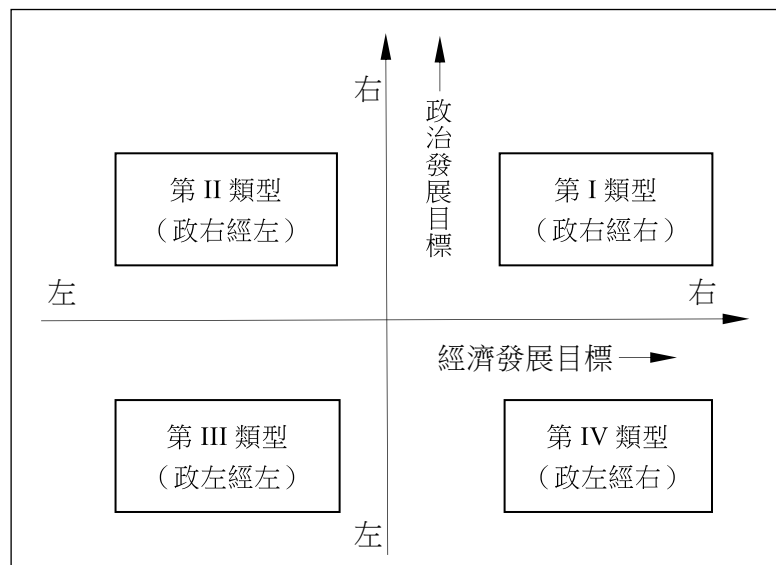


圖 1：政經發展目標分類模式圖

二、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立意抽樣的方式，選擇在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兩岸關係議題上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專家、官方人員及業界代表，訪談對象包括不同政黨背景，且都在相關議題研究超過 25 年以上的經驗者。本文於 2015 年初即著手訪談事宜，包括設計訪談大綱、尋求訪談對象，最後確定 10 位訪談對象，並與訪談對象約定訪談時間、地點與訪談形式。本文遵守研究倫理，並以客觀呈現訪談所獲資料。

參、中國大陸政經制度類型分析

本節依據中國大陸對各種政經意識型態之表述現況，包括「廣東模式」、

「第三道路」、「重慶模式」，以及中共中央政策，就圖 1 的分類模式進行分析。

一、廣東模式

在 2006 年之前，中國大陸已經出現諸如「廣東模式、溫州模式、蘇南模式、膠東模式」等概念（喬耀章，2012）。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由於中國大陸的區域差別太大，中共中央只能原則上依據「摸著石子過河」的政策原則，任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訂政策，只要不出問題，實則任其行之。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區域差異的複雜性，致使中共中央不能制訂單一明確的整體性具體政策做為。「廣東模式」形成的根源，乃是對執政者提出自治、法治、民主的要求。

廣東的法治建設、社會建設旨在重新安排政府與市場、與社會的關係，規範政府自身的行為，容納新興中產階層參與政治。因此，它的「改革」色彩較為濃重。這種改革涉及到政府自身的轉型，具體說是政府權力的收縮，難度比較大（秋風，2011）。

根據美國之音（2015）的報導，曾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憲政學者張博樹提出：解決中國所有社會和政治頑症的關鍵，為促使中國共產黨黨內發生分化，終結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一步一步地實現中國的憲政轉型。但實現民主憲政不必是一個快速、劇變的突發轉型過程。一個體制內應外合的、民間施加壓力的，漸進性的和平轉型會更容易被接受，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大。2010 年由於中國體制內，容納不下張博樹的獨立主張，而將他趕出了社科院。

該報導也指出王天成對張博樹主張的漸進式的和平轉型持懷疑態度，認為中共中央不會自動放棄政權，中國需要中東式的快速變革才能達至民主憲政制度。王天成認為，快速轉型比漸進式轉型的社會成本會更小、動盪更小，但不必使用暴力方式。中國的快速轉型不必是中東式的所謂「非常序性快速轉型」，它也可以是波蘭、臺灣式的所謂「常序性快速轉型」，即政府的權力秩序沒有被打亂。這包括掌權的獨裁者選擇轉型，或者是新上臺的人開始改革。王天成也指出，目前中國各地有許多非暴力抗爭的範

例，但這些抗爭都是自發性、沒有策略的行動，對推動中國的憲政轉型功效不大。

廣東和重慶都在進行改革，儘管其方向大不相同：廣東試圖深化原有的改革（經右），解決增長所帶來的社會結構變化的問題（政右）。重慶當局不得不試圖對改革模式本身進行某種程度的改革（政左經左）。這可能也正是公眾對兩者的評價大不相同的根源所在。人們容易接受「廣東模式」，而較難接受「重慶模式」。由前述意義，在本文分析架構中，「廣東模式」是屬於政右經右的第 I 類型。

二、重慶模式

「重慶模式」一詞，最早出現在 1983 年。城市改革為中國大陸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期重點，重慶於 1983 年開始進行城市綜合改革試點，被稱之為「重慶模式」。198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對開展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全面改革進行研究和部署。試點城市的主要任務是進一步搞活企業，尤其是大中型企業；進一步對外對內開放，發展橫向經濟聯繫；綜合運用經濟槓桿，加強宏觀的調節與管理。中央指示試點城市應從這三個方面努力探索，力爭取得新的突破。

蘇拉（2011）直指「重慶模式」，即意識形態全面「左傾」、經濟上大力引資加上民生上向草根傾斜。其「左傾」的代表就是唱紅歌、傳箴言、讀經典、講紅故，簡稱「唱傳讀講」。薄熙來利用曾任商務部長的廣泛人脈，為重慶設立了內陸特區「兩江新區」，引入了大量外資，並誇下海口，3 年內要為 200 萬人建 4,000 萬平方米的廉租房，規模為中國大城市之最，更矢言要將基尼系數降至 0.35 以下。然而，對於這種混合了中國、古巴、朝鮮的「重慶模式」，中共高層並未有共識。就此觀點，「重慶模式」在意識形態上是完全屬於左派的。

蕭甫（2012）乃將「重慶模式」比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幹部整風運動」，主張保持執政黨的純潔性，打擊西方「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等等。他認為：第一、必須把堅持馬列主義的指導地位，任何改革都不能超出四項基本原則的範圍；第二、必須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

工作；第三、發展必須統籌兼顧，統籌城鄉的發展，統籌地區的發展，統籌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統籌人與自然的發展；第四、必須毫不動搖的壯大公有制經濟；第五、任何發展必須堅持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標準，正像薄熙來提出的那樣，絕不能整天圍著富人轉，而疏遠了群眾；第六、必須走「民生導向，縮差共富」的道路；第七、必須保持執政黨的純潔性。及時吸納具有共產主義信念的進步分子，及時清理喪失理想的退化變質分子和叛徒。

在 2011 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重慶經驗」學術研討會上，多位學者綜述「重慶模式」的左派屬性。「重慶市委黨校蘇偉教授指稱重慶正在開展一種新型的民主實踐，依靠強政府去推動民主氛圍的形成。—重慶提出以民生為導向的發展路子，本質就是薄熙來書記要求的『以社會主義的方式來組織生產』」。西南財經大學趙磊教授認為：重慶經驗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但我們偶爾也能聽到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質疑的聲音，說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教育是左的產物，是空洞的說教，—現在確實有一種勢力千方百計地要把馬克思主義曲解—（彭健，2011）」。

「重慶模式」在經濟上左傾，西蒙周（2010）指出，重慶這場試驗，強調政府的全能作用，通過政府主導，有逆市場經濟潮流而動的意思。經濟活動從微觀上看，都是自發和隨機的，但從整體宏觀上看，這種自發隨機的行為卻恰恰體現了市場的配置，因而也是有序和合理的。全能政府逆市場而動包辦一切，恰恰違反了這樣的經濟規律。

也有學者認為「重慶模式」介於新左與新自之間，如蘇偉（2012）指出「左派」「過分」踴躍，但解讀為「舉毛澤東的旗幟」、「糾改革開放的偏向」，故有擴大重慶影響的一面，又有「幫倒忙」的一面；「右派」則比較懷疑、抵觸、置疑甚至抨擊；「中派」比較認可，但深入並持續研究的還不多；「重慶模式」要堅持自己的發展軌跡，既不能受右面的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又不能受左面的「新左派」的影響。

榮劍於 2012 年的〈「重慶模式」能否超越左右之爭〉一文中指稱：蕭功秦披露了重慶在展示左的方面所出現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場景，正因如此，有理由擔憂，左的現象在一種現有制度的安排下可以達到何種程度。重慶

想要的效果是，通過左中右派的去意識形態化解讀，進一步確立「重慶模式」的合法性，確立其意識形態的正當性。而蕭功秦要求重慶放棄那些充滿濃厚意識形態甚至文革色彩的做法，左派包括重慶方面並不會滿意。「唱紅」是「重慶模式」意識形態化的主要表現方式。「唱紅」可以輕易把人的嘴堵住，老左派罵人不必顧忌什麼，實在出格了，有關部門最多私下提醒下，而右派罵街，搞不好就進去了。這說明了中共中央左派的性質。

事實上，「重慶模式」已經形成了諸多具體政策，它的本質是利用強政府既有的權威，對於經濟增長的各種制度安排予以調整。它以強政府的存在為前提，而不涉及政府相對於社會、市場的權力的調整，因而進展似乎非常迅速。但是，這種調整在另一個方面展開了改革：它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安排了效率與公平的排序，把公平置於效率之上，至少將兩者等量齊觀。這一點，對主流改革模式作了某種修正。

薄熙來主導的「重慶模式」，最終面臨了失敗的命運。王正旭（2012）指出薄熙來在重慶的作為，逐漸偏離中央的政策路線。連雋偉（2012）亦指出中共黨內的對立情勢，中共和政府內的一些保守派退休官員、學者超過 1,600 人聯名上書中央，指責總理溫家寶「顛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提出罷免。他們指責溫家寶違反憲法，充耳不聞國營企業員工的聲音，擅自解體國企、發展私企、優惠外資，結果造成貧富懸殊，顛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並指出溫家寶指示關閉宣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烏有之鄉網站是「侵犯人民言論自由的重大政治事件」。此外，共同社還引述保守派人士的話說，「信中還要求寬大處理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打擊改革派，突顯了黨內路線對立激化的形勢。

雖然，中共中央宣稱「沒有所謂的重慶模式」，薄熙來與他的「重慶模式」謝幕，也已成爲定局（張鳴，2012），但是中國改革開放自 2004 年以來的第三次爭論方興未艾（鄒東濤，2009）。薄熙來的「重慶模式」不可能只是一個行將消逝的過程而已。事實上，它已引起廣泛的注目與爭論，仍將延續中國未來制度變革的意識形態辯論焦點。從諸多學者的論點觀之，「重慶模式」在本文的分類模式中，屬於政左經左的第 III 類型。

三、第三條道路

2005 年 10 月 23 日至 26 日，「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專業委員會」與四川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共同舉辦「共產黨執政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學術研討會。中共中央黨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等 25 個單位的 60 餘位專家學者參與，在會議中多數中國學、官兩界對於第三條道路表示默許與肯定。

中國大陸學者楊曉華（2001）認為，上個世紀末以來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理論探索與實踐調整為「第三條道路」的反映。「他們相信現實社會主義是專制獨裁、集權主義、官僚主義的體制，堅定地與科學社會主義決裂，強調自由、公正、互助等基本價值，以及和平、民主、社會進步等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傳統來建設歐洲，塑造一個帶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歐洲社會模式。他們放棄了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制度的含義而只把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學說來看待。在政策執行上，他們要求加強政府的有效干預，生產效率和社會公正並重，不再強調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化而主張務實地對待私有制和私有化。……在國際問題上，他們認為當今世界存在著由於饑餓、貧窮、環境破壞、國際犯罪、毒品交易、恐怖主義、宗教衝突、種族衝突等大量威脅國際安全的因素，所以他們的對外目標是謀求國際和平與穩定，實現更多的人權和民主，爭取較為持久的富裕。」然亦有批判的聲音，認為此種改革調整缺乏根本的一以貫之的原則，為一種急功近利的政治短視，尚須持續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冷靜觀察，批判對待。

中國視代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與代表伯恩斯坦「第三條道路」的歐洲「民主社會主義」，為國際共產主義的兩大對立流派。中國學界一向以前者為自居，然而，進入 21 世紀以來，此種壁壘逐漸鬆動，甚至主張正面肯定後者。吳嘉蓉教授（2005）從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及其國際組織－「社會黨國際」，以及歐洲諸國最具代表性的政黨－「社會民主黨」在當代的政策調適做為分析，認為中國大陸應該從歐洲社會民主黨的變革中取得借鑑。她指出：「社會民主黨」的修正，有一個「實踐先行，黨綱滯後」的過程。「社會民主黨」完成了從工人階級的政黨到全民黨的

轉變，是在資本主義框架內超越資本主義。當今世界已經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傳統對立思維已經不能解釋、認識和判斷，而這需要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觀點重新建構兩者及其關係。她也指出，中國應該打破只有透過體制外革命方式建立社會主義的思維定式，在中國不應當擔心資本主義多了，反而應當擔心是否少了。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應當建立在更加理性思維的基礎之上，應當以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對待民主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差異。

大陸學者對歐洲第三條道路的觀點，多有關注與正面肯定，是否將會成為更多的討論與選擇，不宜排除其可能性。此種第三條道路，即為本文分類模式中，屬於政右經左的第 II 類型。

四、中共中央政策

中共中央一直以來的政策發展目標，應該歸類為本分析的何種類型模式，將從其經濟政策的市場自由度有無呈現明顯差異，以及政治意識形態的屬性進行觀察，此為首先將予釐清的問題。至於中共中央迄今是否仍然確實稟承了鄧小平的理念原則，沒有顯著偏離，而可以被視為沒有變異的一種基本模式，以及其政、經、左、右的屬性，則為首先應予探討的問題。經由對其定性，始能作出對中國大陸其他觀點的比較結論。

中共中央政策一向被視為「政左經右」，以下就學者的觀點作為佐證，榮劍（2012）指出：中國前三十年的改革路線，就是不搞政治改革，儘管也提提口號。實際上，從 1989 年以後，政治改革就全面停頓了，只是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亦即，「政治高度專制，經濟自由化」。鄧小平在經濟上完全是右的立場，他提出了市場經濟的概念，確立了 1992 年以後中國改革的總路線。而 1989 年以前的左右之爭，主要體現在左的教條與胡耀邦改革主張之間的衝突，實質是馬克思主義內部的意識形態之爭。到 1992 年以後，爭論雙方的代表人物或死或下台，爭論也就自然消失。之後，鄧講不爭論，不問姓資姓社，放棄意識形態的爭論，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搞改革。榮劍認為，鄧的南巡講話「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因為他認為在文革和改革的前十年裡，干擾破壞主要來自左。榮劍的觀點，說明了鄧的

政策，在經濟上完全是「右」，但在政治上完全未變即屬「左」。

鄧小平時代延續下來的「政左經右」原則，意指經濟上，力行改革開放；政治上，堅守共產黨的執政權力。1992 年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進入政治局以來，仍不改此一原則，「甚至政左經右的反差更加明顯，政治領域上越來越保守」。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會更著墨在「社會改革、社會管理」層次上（中時電子報，2011）。

中國改革三十年有三個理論版本。第一，是鄧的理論，實質是實用主義路線，基本路線的重心是發展經濟；第二，是江的「與時俱進」與「三個代表」理論，是要與世界文明接軌，往普世價值靠攏。第三，是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是從技術的角度來設計發展方式，而迴避了意識形態的問題。事實上，在江澤民理論提出以後，引起了黨內巨大爭議，但沒有繼續往前走，遇到阻力後又退回去了，結果導致左右兩邊對江都不滿意。因此，中央黨校教授蔡霞才會重新詮釋，「三個代表」理論就是要用社會民主主義來改造、確定改革路線。至於現在的「科學發展觀」，榮劍認為，越想穩定，社會越穩定不下來，這就說明了制度存在很多問題（榮劍，2012）。從其陳述來看，在政治改革或說意識形態轉變上，鄧的擱置、江的退卻、胡的迴避，以及在三個時期中，中共中央對極右與極左言論的壓制做法，說明三個時期並未作出重大轉變，均保留了中國一貫的左派立場。

社會主義對中國的影響，無遠弗屆。由中共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主任李良棟（2010）的論述，可見一斑。他指出：「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體，是絕大多數人對顛覆和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極少數敵對分子的專政，這就為實現人民民主提供了保障。」「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無論是發展民主還是實行法治，都不能離開黨的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等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為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奠定了基礎。」「三權分立與多黨制，同樣不適合中國國情。」這些乃是依據鄧小平以往講話的內涵精神：「我們在宣傳民主的時候，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地區別開來」。可從其陳述，了解中共中央對民主的界定。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的色彩逐漸減少。喬耀章（2012）說明中國大陸的「一少」，指人們越來越少地使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有意無意地「去社會主義化」，用「中國特色」取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而使社會主義淡出「中國特色」。然而，其主流仍強調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他談到在國外的報告裡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搞「特色」社會主義，而不說搞資本主義。在中國大陸內部也有人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褪色的社會主義，但實際上是搞新民主主義，就是把已打倒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又請了回來。廣東模式、溫州模式、蘇南模式、膠東模式等等，都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地區模式。

中共中央的態度與立場，顯示了「政左經右」的一貫方針，在本文的分類中，宜應屬於第 IV 類型。綜合以上的分析，就本文分類的原則與相對比較意義而言，中國大陸「廣東模式」屬於圖 2 中的第 I 類型、「第三道路」屬於第 II 類型、「重慶模式」屬於第 III 類型，中共中央政策則屬於第 IV 類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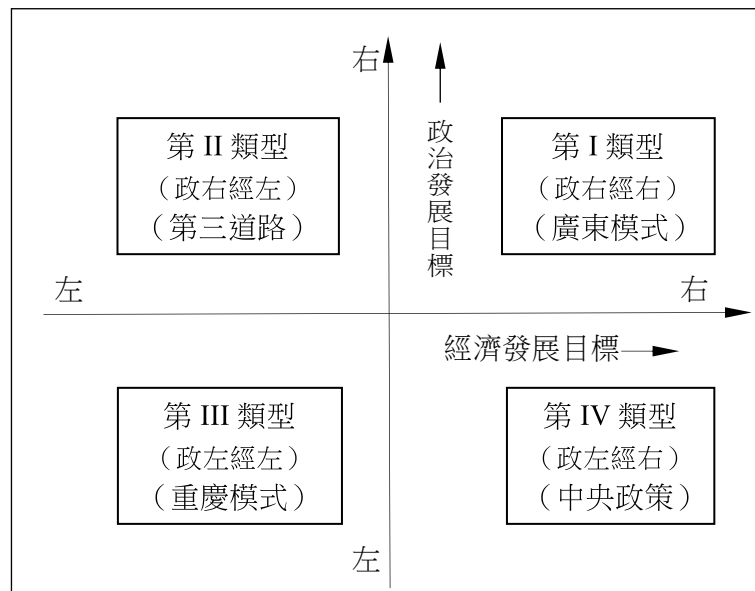


圖 2：中國大陸政經模式分類圖

至於習近平的政策類型是否與鄧同屬一個類型？如果觀察中共中央執政團隊係一直承襲鄧的路線，成為主流，因此也未被批判及反對，說明它的答案是肯定的。從這個意義來說，迄今為止，中共中央的態度與立場，亦包括習近平的政策目標傾向，顯示了「政左經右」的一貫方針。在圖 2 中，宜應屬於「政左經右」的「第 IV 類型」。有了這樣的判斷結果，基於比較的方法，即可以對中國大陸現有各種論點作出本文分類模式的定位。

綜合以上的分析，就本文分類的原則與相對比較意義而言，中國大陸「廣東模式」屬於圖 2 中的第 I 類型、「第三道路」屬於第 II 類型、「重慶模式」屬於第 III 類型，中共中央政策則屬於第 IV 類型。

肆、習近平的制度趨向分析

根據上述闡述，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制度存在四種可能性，習近平時代將會有何種發展，本文則採取深度訪談方式進行觀察。其方法上的意義，在於客觀徵詢專家觀點，並進一步對本文的分析架構作出某種程度的檢驗。訪談期間為 2015 年 10 月至 11 月，有關訪談對象的背景、訪談日期和訪談地點，如表 2。後續引述訪談內容來源，以此方式表示，例如：「A，2015/10/29」，第一個英文字母為訪談對象代碼，後面數字為訪談的年月日。本文採用訪談方式的對象，並未事前已普遍接觸或理解本文分類方式的意指，而本文亦不願在訪談時給予其被動式先入為主的暗示，因此僅能就其個別主觀認知提出觀點，最後對照本文所提原創性的類型概念，進行比較分析，以理解其與本文觀點的一致性程度，藉此驗證本文論述的合理與否。

本文根據研究目的設計訪談大綱：「中共中央的政策為政左經右，請問您認為習近平與中國大陸未來政治會往左或右發展？為什麼？經濟是否會繼續維持右，或是會往左發展？為什麼？」，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採開放態度，受訪者可依此主題暢所欲言，研究者並根據受訪者的回應追問，以期得到較為完整的紀錄。根據訪談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認為習近平將維持「政左經右」的政策，部分受訪者認為中國將走向「政右經右」的道路，亦有少數觀點認為中國無左右問題，而是視現實情況而做政策的調整。

表 2：訪談對象一覽表

代碼	研究對象背景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A	大學教授兼前所長、中國研究專家	2015/10/29	臺北市北投區
B	大學兼任教授、兩岸研究專家	2015/10/25	臺北市立大學
C	大學教授、智庫諮詢委員	2015/11/02	臺北市南京東路
D	大學兼任教授、前高階文官、兩岸研究專家	2015/11/04	臺北市羅斯福路
E	大學教授、兩岸經濟、社會研究專家	2015/10/30	臺北市復興廣播電臺
F	博士、中國政治軍事研究專家	2015/10/23	新北市板橋區
G	大學教授、兩岸經貿類智庫理事長、兩岸經貿研究專家	2015/10/26	臺北市立大學
H	大學兼任教授、業界臺商創意總監、大陸投資顧問	2015/10/24	臺北市立大學
I	大學兼任教授、中國研究專家、智庫副理事長、現代史研究背景	2015/10/25	新北市新店區
J	大學兼任教授、中國研究專家、業界職訓教授	2015/10/27	桃園市中壢區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一、習近平將維持政左經右的政策

(一) 政治將維持中央集權形式

習近平接任中國國家主席後，全面實施打貪的措施，無論是中央或地方、國資委、華潤石油幫、中遠等央企的高層，以及海外的金融機構等皆無一能倖免。例如前中常委周永康、江澤民的子弟兵令計畫等高官都紛相遭到羈押。與此同時，習也打壓維權人士、異議份子、收緊網路、媒體言論，並在全國大動作升高反恐力道。在對外關係上，習近平於東海和日本交手，在南海和菲律賓、越南過招，在虛擬世界和美國大打網路駭客戰，姿態愈趨強硬。三方點火後，又透過五月在上海舉行的亞信峰會，對世界宣示「亞洲事務，亞洲人自己管」，亞洲是中國的地盤，不許他人插手的態勢。(D, 2015/11/29)

檢視習近平在國內外都「來硬的」作風，主因乃是為了排除萬難，推動

新一波「深化改革」的諸般手段。改革的目的，當然就是為全面達成小康社會的「中國夢」。而此夢的背後，實是維護中共政權的存續。相對的，另一種意識形態的政爭，又將不知覺的浮出政治檯面。事實上，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理想，不再為大多數中國人所追求時，維持經濟成長、改善人民生活，讓大家有錢賺，已成當前中共政權正當性的主要、甚至唯一來源。而維護這個正當性，自然就是中共全黨上下最重要的政治任務。但改革開放 30 餘年來，此項政治任務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瓶頸與挑戰。例如政府的結構性貪腐、錢權情的勾結、貧富差距擴大、環境汙染惡化、富人出走，中南美國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徵兆，都陸續在中國出現。(D, 2015/11/29)

如果中國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成長陷入長期停滯，將是中共最大的噩夢。胡錦濤卸任前，兩次在公開場合疾聲呼籲，「貪腐不改，將亡黨亡國」。習近平在北戴河會議上也說，「2013 年的中共和 1948 年的國民黨情況相似，不徹底改革，將失去江山、人心」這樣的重話。於是，中共在十八大三中全會的 60 項深化改革方案中推出對政權正當性與存續的危機感，正是驅動習近平與黨內精英反貪與改革的內在力量。(D, 2015/11/29)

習近平大動作改革與打貪，必定遭來既得利益集團反撲，習近平的因應之道，就是在國內打壓維權人士、收緊媒體網路言論；在國外展現強硬的維護主權姿態，對利益集團和保守派，有所「交代」。林中斌比喻，習近平用這些手段當作「盾」，掩護反貪與改革的「矛」，對外強硬，除了有保護中國日益龐大海外利益的現實需要，也是為了對內表態、收割，以免重蹈 80 年代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被保守元老鬥下臺，「改革未捷身先死」的覆轍。(D, 2015/11/29)

在政治上，中共掌握民主與民主為何者形式的話語權，向西方標準的右傾修正，目前尚不可能，基層鄉鎮的公推直選活動，離民主的內涵仍有差別，可說是中共的另類發展。事實上，中共的集權體制維繫，必須在三個條件下進行，領導者對國家治理有能、政府官員有德，人民生活安定。相對應的便是秩序與成長、反腐與法治、扶貧與福利，這也是中共執政的主要條件，也是被中共執政清醒的理解。因此，我們見到中共政府組織的再造，卻見不到政治權力結構或制衡性設計的調整，更不用說照搬西方民主的標準構建中共政治體制的變革。(F, 2015/10/23)

中國存在於政策為政左經右的困惑，在於「政左經右」理念的分歧。換言之，「政左經右」之左，只能是「以共黨一時專政之左／促進經濟發展之右」的「方法論」；而不能演變成「以促進經濟發展之右／來維持共產永久執政之左」的「目的論」。因此，檢視「政左經右」若形成左右不分、政經撕裂，也會影響中共政權的延續性與正當性。(J, 2015/10/27)

中共的意識形態雖然貌似堅定，不容動搖，但是我認為，它比意識形態更重要的，則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永遠執政。鄧小平都可以修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甚至否定永遠鬥爭，初級階段的漫漫無期，以及後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些論點早已偏離共黨理論遠矣。修改的目的，無非在於因應情勢變動下的政權掌握。說的好聽些，那是與時俱進，說的直接點，那就是掌握中國共產黨的話語權，目的就是為了繼續擁有政權。因此，我認為，在中國大陸人民逐漸增高其需求的情況下，政治民主的需求會在地方層級適度逐漸被滿足，但卻難以達到中央領導權的分享。如果上下能夠相安無事，那可以說明中共創造了一種不同於西方的新的民主制度，那是上下有別、局部性的民主制度，如果可以說它也是一種民主制度的話。除非發生另一種情況，又出現了一位轉折性的人物，徹底改變了一黨專政的制度。這種可能性當然存在，也並非沒有前例，譬如說，前蘇聯的戈巴契夫等等。(B, 2015/10/25)

(二) 經濟持續開放政策

經濟上，人民幣連貶數月，直到最近才稍止。李克強再推微刺激，實施「定向降準」，同時在 5 月高調宣誓調結構、不走灑錢刺激成長老路的決心。新華社在 6 月初也為李克強的經濟學護航。故習的「政治向左」是為了「經濟向右」，為了替全面深化改革，殺出一條政治血路。矛與盾能否用的好，「政左」能否掩護「經右」，將會決定這條「血路」能否順利開出。(D, 2015/11/29)

大陸的政治經濟是合在一起不太會分離的，但是我們仍可以分開來談也可以看出它們之間的關聯性。大陸的社會主義市場的經濟，已經從過去計畫經濟完全轉化成國家資本主義的路線，或者更多如他們自己所說的市場的社會主義。臺灣在 1980 年代民營化越來越像自由經濟的路，大陸如果再把自由放寬，其實會跟現在西方完全一模一樣，臺灣現在走的路，大陸將來也有可能走。大陸已經成為 WTO 的會員國，經濟和國際接軌是必然的，他也加入了許多國際重要的經貿機構(如 word bank、

IMF)或是區域的經濟合作組織與金磚國家的論壇，可以看出大陸很想與周邊國家將經濟整合在一起，不可能鎖國也不可能封閉自己，甚至還希望可以加入 TPP，避免將來可以跟全世界先進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自由貿易的組織被別人淘汰，大陸 2013 年先啟動了上海自由貿易區的實驗。2015 年也增加了福建、廣東與天津三個省，明年可能擴大到內地的省市。我覺得大陸在這一塊而言，國家的干預是不會放棄的，然而往自由的道路也會一直走，我們臺灣有時還跟不上他的腳步。(E，2015/10/30)

中共對於前蘇聯解體因素，其中對於戈巴契夫的政治右傾改革，以及經濟的休克療法，是經常被提及失敗的主要經驗。換句話說激進的改革，並不會被納入政經改革的意識當中。未來中共國家的發展，仍是政左經右的格局，其分別的原因是，中共經濟體已經相當龐大(全球第二大)，經濟發展已非國內財政與貨幣政策得以滿足，必須持續面向國際經濟環境拓展開發(如走出去政策)，中共經濟發展，強調實體經濟與技術創新發展，並未陷入虛擬經濟的單一類別思考，因此，面向市場必然是要進入全球市場與經濟開放性質的邏輯使然，與西方較為不同的，乃是國家資本的操作與個體資本的營運的差異。(F，2015/10/23)

經濟制度，中共現在的做法，可以視其為國家干預下的自由經濟或資本主義制度，當然是右派的做法。但是，中共不太可能再固執於社會主義或者資本主義的任一種極端。因為他們相當理解兩者的極端後果，至少這種觀點與態度，會比政治意識形態維持的更久。若真要作出明確的說法，我認為，可預期的未來，中國大陸的經濟是國家干預下的右，政治則可能另創一種非西方的民主制度。至於長期，則難以預料了。(B，2015/10/25)

二、政治和經濟將朝開放方向進行

(一) 政治將逐步自由開放

政治方面，中國大陸為了讓自身的政權繼續維持下去，勢必要釋出一些權力，讓人民享有更多的權力，並逐漸開放政黨。當然一定是朝著越來越開放的，我們很難開放之後又再次限制。我想即便是資本主義社會，也是非常重視財富的平均分配。尤其是中國大陸這種以社會主義為根本建立的國家，即便借用資本主義制度，也說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經濟制度。中國政府主張先讓一部分的人富起來，再讓全部的人富起來，全部的人富起來為他們的最終目標，如此也可說是達到財富平均。為了達到全部的人富起來之目標，他們還是必須仰賴資本主義的運作。所以我認為，資本主義是必須的手段，但同時也必須考量社會的財富分配。(G, 2015/10/26)

依習近平的個性可能有往左傾向，不過他個人具有此傾向，不會整個政策都這樣，但換一個領導人就不一樣，不可能永遠都他掌政，看整個環境的趨勢所決定，決策者影響很大也會受其人格特質所影響，也要適度放鬆。整個國家不能只有黨掌握。政治上相當長時間還是往左，但是受西方外來影響與經濟改革、人民價值觀改變，人民會要求黨退出政壇，要比較接近自由民主的話，中國不得不改變。(A, 2015/10/29)

(二) 經濟繼續發展

大陸領導人在意如何快速的提升經濟，如何將政治開放成更接近民主，這是他們的走向。至於這個走向是左是右，到時候再下定論，但是我覺得這個方向非常的明確。中國大陸繼續發展經濟，很顯然他是向右的。經濟一定會是繼續往右的。但中國大陸的經濟就如他們所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那具有中國特色是什麼呢？在過去社會主義經濟，是強調大家都要有飯吃，當中國大陸在發展的過程當中發現，西方的資本主義會產生貧富不均，相較之下，社會主義制度好像比較好。所以中國大陸的經濟確實會繼續朝著右邊發展，且帶著社會主義色彩。我認為中國大陸會持續發展經濟，但他們會設法解決、排除貧富不均的問題，重視社會的財富平均。(G, 2015/10/26)

當然一定是朝著越來越開放的，我們很難開放之後又再次限制。我想即便是資本主義社會，也是非常重視財富的平均分配。尤其是中國大陸這種以社會主義為根本建立的國家，即便借用資本主義制度，也說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中國政府主張先讓一部分的人富起來，再讓全部的人富起來，全部的人富起來為他們的最終目標，如此也可說是達到財富平均。為了達到全部的人富起來之目標，他們還是必須仰賴資本主義的運作。所以我認為，資本主義是必須的手段，但同時也必須考量社會的財富分配。(G, 2015/10/26)

經濟上會繼續往右，資本主義社會他普世價值所在，是人類發展的一個

趨勢，每個國家都會往這個方向走，雖然不可能像世界大同一樣，因為人的私心總是存在總是希望有自己的財產，人都是私心的，私心存在的話，一些制度就必須迎合，中國大陸現在沒有完全迎合，現在發展的是只有部分迎合西方市場和經濟價值，所以才能發展經濟，大陸之所以發展成功，並不是他堅持社會主義黨的領導，而是有限度往西方走。(A，2015/10/29)

三、政治和經濟都將趨於保守

(一) 政治維持中央集權

基礎核心政治上往左，經濟上右中有左，基本上未來的發展還是往它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經濟上採取的西方主義的角度會比較偏向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或者中國式的資本主義，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會慢慢地浮現出來，畢竟他了解西方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後，終究它既然知道如何玩資本主義的社會的遊戲後。重點是去建構它自己的未來的發展，所以習近平所講的中國夢，他希望中國成為脫離以往的所謂氣候不振，成為世界第一大國。但是能不能完全照他的思維去走，也就是西方的制度或者國際社會有國際社會的要求，是不是可以完全去改變這是我們存疑的。不過他正在改變包括習主席去拜訪聯合國潘基文贈送九龍和平圖等，包含國母去演講他開始在改變，也就是既然聯合國強調的教科文組織或者人權組織裡面，所強調的被西方批評的人權的國家竟然能夠在聯合國做一些人權演說，代表他開始用中國式的價值去融入去改變去調整西方式的價值。我們不能用西方的角度，西方的人權民主去看中國大陸的思想及民主人權，它有自己的定義模式。(H，2015/10/24)

習近平跟薄熙來的實質的方向是一樣但內涵不同，方法偏往不是全部往左，薄熙來的太左太紅（共產主義），習近平可能本身對西方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認知，就我個人的觀察他認為社會主義是美好的比資本主義好，他現階段他必須要用西方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或者方式來建構中國大陸所謂的經濟社會強國，他也知道其實人民的生活這些觀念還需要一段時間的調整，不過他自己認為希望民眾的生活水平，以後能夠跟西方的生活水平一樣，從這角度的思維來看來表示就是社會主義價值觀，把貧富差距拉大現階段的貧富差距拉大的過大，一部分是改革開放的速度過快，所以他現在再調整，反貪就是建立正確官僚體制價值，

未來其實觀察一定是往左幾乎政治經濟都往左，只是不會像以前一樣純粹往左偏，內涵及實質的意義不同，不是早期所謂左的概念，在光譜上比較左移一點，比較偏重於社會主義的發展。(H, 2015/10/24)

(二) 經濟右中有左

在經濟上，習近平比較知道西方的遊戲，所以併購及內部的調整，目標是享受西方或歐洲的生活水平，就是社會主義的要求，他用的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方法手段，當然這條路不是一定的康莊大道，可能是一個不是平坦的道路，他不是完全認同資本主義那一套，還是嚮往肯定社會主義的發展，當然不會極端的極左，在光譜上比較左移一點。(H, 2015/10/24)

四、中國為現實主義者

其實我認為用左右來區分政治、經濟的走向並不恰當，中共其實是完完全全的現實主義者，老一輩的中共黨員或許還有理想主義的色彩，但現在的執政者都是走現實路線。就像鄧小平說的「管他是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經濟往右是因為經過實驗證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可以賺錢，而共產主義不能；同樣地，如果哪一天經過實驗證明，民主政治有助於維持中共一黨專政政權的穩定，中共也不一定要堅持現在的作法。我個人認為，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可能是中共未來在政治改革上可能採取的模式。(I, 2015/10/25)

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習近平都是走不中不西的道路，過去三年一直是一下左一下右的狀態，他是拿來主義。原來的政左經右是基本格局，但是會因應情況有所調整，政治和經濟絕對不會有極左或是極右的狀況。(C, 2015/11/02)

根據國內受訪者的意見，呈現了各種不同的觀點，分述如左：第一、有五位受訪者(B、D、E、F、J)，認為習近平將維持「政左經右」的政策，在政治上甚至權力更為集中，控制更為嚴密。對內打壓異議份子和控制媒體，對外的態度趨於強硬，其目的都在於維護和鞏固其政權。其中有受訪者指出中國大陸的意識形態雖然貌似堅定，不容動搖，但是比意識形態更重要的則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永遠執政。在中國大陸人民逐漸增

高其需求的情況下，政治民主的需求會在地方層級適度逐漸被滿足，但卻難以達到中央領導權的分享；第二、兩位受訪者（A、G）認為中國未來將走向「政右經右」的新局，政治上雖然習近平可能仍走「左」的路線，但受到各種因素與趨勢的影響，長期而言，中國終將更多的自由開放；第三、有一位受訪者（H）認為習近平與薄熙來的政策在內涵上雖不同，但在實質方向上是相同的，習近平應該仍是嚮往社會主義的發展，其政策雖然不會極端的「左」，但仍是「左」的思考；第四、兩位受訪者（I、C）認為中國將視現實情況而轉變其政策，十足的現實主義者。在本文的四種類型中，「政右經左」的第三條道路，在此次受訪中，無任何受訪者認為習近平或中國未來會朝此一方向發展，以上為臺灣幾位學者的看法，習近平與中國的政策走向為何，仍待更多的觀察與研究。

伍、結論

經由前述，本文作出如下三點階段性的結論：第一、顯而易見的，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制度，依意識形態的左、右區分，的確可以呈現在邏輯上相對周延與互斥的四種類型。就分類方法的科學性而言，至少在最低程度上已經兼顧其客觀性與完整性，俾便對目前與未來事件進行完整性的觀察與分析。同時，要接受中國大陸這四種類型同時出現的偶然性，則必須先寬容的看待分類的邊界條件，也要接受未來這些模式名詞可能出現修正的可能。主要的原因，在於二分法分類的相對性質，易於簡化而能作出清晰的分類，但也在光譜上存在相當大的容納與模糊空間。

第二、依 Cheng Li（2007）的看法，無論左派或右派菁英的論點，能夠出現在不同的公眾媒體，甚至是中共官方舉辦的公共論壇，顯見均有相當的自由度與被接受度。這意味著，中共官方一直以來遵照鄧小平「摸著石子過河」的實踐原則，而且也容許社會需求與統治權力之間的競爭與平衡。並經由此種過程，在確保政權穩定的大前提下，一步步調適其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實際作為。但也無可避免的，中共中央一旦對政權失控，則將脫離上述模式，而以突變的形式變革其政經制度。

第三、本文意不在於對中國大陸政經制度未來究竟走向何方作出結論，而僅僅是提出這四種可能模式的差異。藉對中國大陸持續的制度選擇的爭論過程中，觀察其在轉變的程度及意義，以此探索可能出現的實際內涵，或許可以判斷其未來出現某種創造性意義的機會與可能性。

參考文獻

- Dogan, Mattei (文強譯), 2010。〈國家的比較：為甚麼比較，如何比較，拿甚麼比較〉。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Driver, Stephen, and Luke Martell. "Left, Right and the Third Way." *Policy and Politics*, Vol. 28, No. 2, pp. 147-61.
- Giddens, Anthony. 1994.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oldstein, Judith,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1993.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uo, Mercy, and Andrew D. Marble. 2007. "China in 2020: Bridging the Academic-Policy Gap with Scenario Planning." *Asia Policy*, No. 4, pp. 2-6.
- Li, Cheng. 2007. "China in the Year 2020: Three Political Scenarios." *Asia Policy*, No. 4, pp. 17-29.
- Marble, Andrew D. 2002. "The 'Taiwan Threat' Hypothesis: Ideas, Values, and Foreign Policy Prefer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8, No. 1, pp. 165-99.
- Zhong kang (音譯), 2012a。〈烏有之鄉週五被關閉 其他一些左派網站同樣待遇〉《阿波羅新聞網》4月7日 (<http://www.aboluowang.com/news/2012/0407/-148732.html>) (2015/10/6)
- Zhong kang (音譯), 2012b。〈天則經濟研究所網站被關閉整頓〉《BBC 中文網》5月1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news/2012/05/120501_china_unirule.shtml) (2015/10/6)。
- 王正旭, 2012。〈薄熙來事件對中國共產黨及大陸社會的警示〉《展望與探索》10卷5期, 頁5-9。
- 西蒙周, 2010。〈重慶模式〉《香港商報》12月13日 (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0-12/13/content_2652535.htm)
- 冷溶, 1995。〈中國共產黨50年的理論探索及重要啟示〉《甘肅理論學刊》頁10-13。
- 吳嘉蓉, 2005。〈論社會民主黨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改良—認識當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互關係的新視角〉《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專業委員會年會暨「共產黨執政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97-204 (<http://cpfd.cnki.com.cn/Article/CPFDTOTAL-ZDDS200510001021.htm>)。
- 李良棟, 2010。〈自覺劃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

- 《中共共產黨新聞網》6 月 2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11758216.html>) (2015/12/7)。
- 李零，2008。〈讀《動物農場》(一)〉《讀書》7 期 (<http://www.eywedu.com/dushu/dush2008/dush20080710-3.html>) (2015/10/25)。
- 沈寶祥，1999。〈中國社會主義 50 年的成就及經驗教訓〉《甘肅理論學刊》頁 15-16。
- 林凌，1984。〈論城市改革〉《經濟體制改革》4 期，頁 1-9。
- 林凌，2012。〈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全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新華網》9 月 5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7/content_2557478.htm) (2015/10/29)。
- 秋風，2011。〈廣東模式與重慶模式的政治意涵〉《文化縱橫》5 期，5 月 1 日 (<http://www.qikan.com.cn/Article/whzh/whzh201105/whzh20110501.html>) (2015/10/28)。
- 美國之音，2015。〈民主中國走向 兩本新書 兩種主張〉9 月 8 日 (<http://www.voacantonese.com/content/article-20120523two-new-books-two-roadmaps-to-democracy-in-china-153059565/1147562.html>) (2015/10/21)。
- 展江，2012。〈直面真相就是新聞的社會責任〉《時代週報》70 期，5 月 24 日 (<http://www.dooland.com/magazine/online.php?pid=NTE>) (2015/11/18)。
- 徐淑敏，2014。〈重慶模式的緣起與政策意涵〉《展望與探索》12 卷 7 期。頁 34-55。
- 殷敘彝，2009。〈「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區別〉《中國文明網》11 月 21 日 (http://hxd.wenming.cn/mkszy/2009-11/21/content_69023.htm) (2016/3/2)。
- 秦暉，2006。〈當代中國的「左與右」〉《新浪愛問共用資料》12 月 17 日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3700439.html>) (2015/10/28)。
- 常修澤，2005。〈中國新發展模式下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學習與探索》161 期，頁 8-10。
- 張倫，2012。〈點評中國：王立軍、重慶模式與中國思潮轉變〉《BBC 中文網》2 月 28 日 (<http://www.hkreporter.com/talks/thread-1494906-1-1.html>) (2015/12/1)。
- 張鳴，2012。〈撲朔迷離的重慶模式〉《明報通識網》4 月 13 日 (<http://life.mingpao.com/cfm/dailynews3b.cfm?File=20120413/nalfa/faa1h.txt>) (2015/11/18)。
- 梁曉，2012。〈他為中華民族振興指明了道路：從編輯鄧英淘《新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說起〉《香港傳真》頁 1-12。
- 連雋偉，2012。〈薄案保守派反撲 老幹部聯名上書 罷免溫家寶〉《中時電子報》8 月 10 日 (<http://tw.news.yahoo.com/薄案保守派反撲-老幹部聯名上書-罷免溫家寶-213000886.html>) (2015/10/27)。
- 黃玉琦、房爽，2012。〈官員、學者解讀《辯證看 務實辦—理論熱點面對面·2012》〉《人民網》6 月 28 日 (<http://fangtan.people.com.cn/n/2012/0628/c147550-18403243-1.html>) (2015/11/4)。

- 喬耀章，201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概念再定位及前瞻性審思〉《南京社會科學》2期，頁57-64。
- 彭健，201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重慶經驗」學術研討會綜述〉《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3卷5期，頁140-41。
- 無作者，2005。〈批判「政左經右」體制〉《蘋果日報》1月18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international/20050118/1521793>）（2015/11/17）。
- 無作者，2005。〈學術動態〉《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6期（<http://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DDSJ200506036.htm>）（2015/09/12）。
- 無作者，2011。〈李忠尚教授新著《第三條道路》日前問世〉《中國經濟網》7月28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107/28/t20110728_22571971.shtml）（2015/11/14）。
- 無作者，2011。〈第五代領導人仍將政左經右〉《中時電子報》3月26日（<http://tw.news.yahoo.com/第五代領導人仍將政左經右-20110325-115704-654.html>）（2015/11/17）。
- 無作者，2012。〈直面真相就是新聞的社會責任〉《時代週報》70期，5月24日（<http://www.dooland.com/magazine/online.php?pid=NTEwNTY=>）（2015/09/15）。
- 程永林，2003。〈相容性思想：全球化進程中社會主義觀第三次飛躍的哲學基礎〉《廣東行政學院學報》15卷6期，頁9-12。
- 黃樹東，2011。〈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式有四種可能〉《人民論壇》33期，頁67。
- 楊曉華，2001。〈冷戰後社會民主黨理論政策調整的內容及原因〉發表於「當前國際政治與社會主義發展學術研討會」。中國北京：北京市國際共運史學會。
- 楊繼繩，2010。《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修訂版）。香港：天地圖書。
- 鄒東濤，2009。〈要客觀辯證歷史的看待改革開放的第三次大爭論〉《中國共黨新聞網》4月29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9154/49155/9214628.html>）（2015/10/22）。
- 榮劍，2012a。〈「重慶模式」能否超越左右之爭〉《共識網》2月1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201/52858.html>）（2015/10/22）。
- 榮劍，2012b。〈當前中國社會政治思想狀況〉《新世紀新聞網》5月27日（<http://www.newcenturynews.com/Article/gd/201205/20120527163134.html>）（2015/10/29）。
- 黎堡，2012。〈兩本新書 兩張路線圖 民主中國何去何從〉《美國之音》5月23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20523-china-democracy-books-153010995.html>）（2015/11/20）。
- 蕭甫，2012。〈重慶事件是一面鏡子〉《天下論壇》6月9日（http://bbs.creaders.net/politics/bbsviewer.php?trd_id=728153&viewer=new&language=big5）（2015/11/20）。

鍾一曄，2011。〈李忠尚教授新著《第三條道路》日前問世，中共學者概括的指稱，改革開放就是第三條道路〉《中國經濟網》7 月 28 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107/28/t20110728_22571971.shtml）（2015/12/4）。

蘇拉，2011。〈「重慶模式」與「中國特色」〉《多維新聞》4 月 19 日（<http://china.dwnnews.com/big5/news/2011-04-19/57634007.html>）（2015/11/5）。

蘇偉，2012。〈「重慶模式」是怎樣被誤讀的？〉《共識網》2 月 1 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201/52864.html>）（2015/11/5）。

The Curre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alities in China and Xi Jinping's the Influence

Shu-Ming Hsu

*Chair,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Taipei,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outline and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ies and politics of China and how this has affected the economy of China, and also the possible direction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y take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establish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will use two systems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and two ideologies of the “Left” and “Right” by incorporating four models. These are the Guangdong Model, the Chongqing Model,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olicy Model, and the Third Way Model. This paper also looks at the in-depth Interview of Xi Jinping and how he is likely to shape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uture. This interview indicates, as most experts agree, that Xi Jinping will generally maintain the same policies of “Politics Left, Economics Right” that has so far guided China's recent policies, but that he will also move towards a more centralized form of government in order to maintain and consolidate his political power. This analysis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may reveal and expla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China is currently facing and how Xi Jinping will face and try 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

Keyword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Left and Right, Chongqing Model, Guangdong Model, Third Way Model

